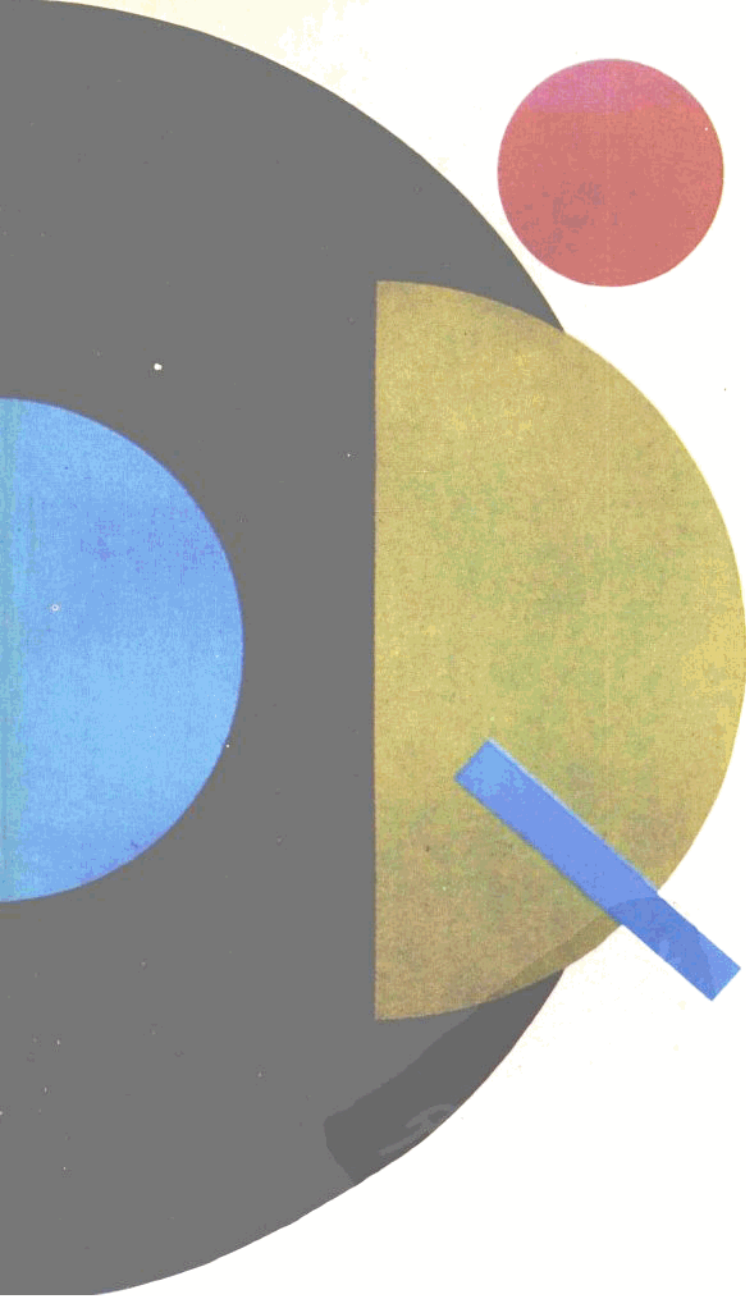


忧郁的 灵魂

季红真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小说创作中的性描写刍议·····	(1)
中国近年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	(8)
有关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一点随想·····	(30)
历史的命题与时代抉择中的艺术嬗变	
——论“寻根文学”的发生与意义·····	(35)
女性主义	
——近十年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基本主题·····	(68)
论寻根后小说·····	(80)
广阔时空背景中的多维心理意向	
——读王蒙《活动变人形》·····	(114)
李杭育初论·····	(117)
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精灵	
——莫言散论之一·····	(138)
现代人的民族民间神话	
——莫言散论之二·····	(153)
神话世界的人类学空间	
——释莫言小说的语义层次·····	(173)
精神放逐者的内心独白	
——刘索拉小说的语义分析·····	(197)
读《野草莓》·····	(209)
精神流浪者的智力游戏	
——王朔《玩的就是心跳》索解·····	(214)
一无所有者的自我剖白	

——读徐星《剩下的都属于你》	(225)
超越困境的精神建构	
——史铁生小说的终极语义	(229)
小说蜕变期的形式研究	
——读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237)
神话的衰落与复兴	
——叶舒宪《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读后	(243)
心灵深处的圣地	
——序王小平小说集《金戒指》	(256)
激情生命的诗意呈示	
——序《谢冕先生评论集》	(259)
文化“寻根”与当代文学	
——序《新时期文艺理论大系·文化寻根卷》 ..	(263)
文化变异期的文学观念面面观	
——序《中国作家如是说》	(276)
叙事方式	
——形式化了的小说审美特性	(292)
文学批评学：框架与构想	(309)
后记	(338)

小说创作中的性描写刍议

如今写性是一大时髦，这不奇怪。“饮食男女，人之大伦”，连我们古代的圣贤大儒也不回避这一人类生命现象中最基本的真理。那么，作为人学的文学，也就成为难以回避性的问题。

然而，文学毕竟不同于生理学和心理学。尽管现代生命科学已经向我们展示了生命内部无穷的奥秘，尽管由弗洛伊德所开创的泛性主义精神分析学说遍及全球，遇到形形色色的诘难、批判与矫正、补充，以至于他晚年连自己也有些动摇，认为那更多的是艺术想象。无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性持有什么样的见解：理性的、中性的、无性的；无论人们持有怎样的性道德：禁欲、爱情至上、发乎于情止乎于礼，以及男权中心，女权主义、性解放等等，人类的生命都世代地繁衍着，并以艺术的样式留下自己的印痕。

古来已有的斯芬克斯之谜，至今仍困惑着人们。每个时代都有自己不同的解释及求证方式。因此，在社会历史激变的时代，作为社会伦理规范的道德必然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就象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中描述过的那样，两性关系经历了对偶婚姻取代杂婚，继而又被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所取代的发展过程。就象薄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巨人传》

以及卢梭的《忏悔录》所表现的那样，人们对新道德的呼唤总是以旧道德自身的腐败僵死为前提。而笑笑生的《金瓶梅》，说不清是暴露还是欣赏的大量性描写，则显然以明代从经营到消费商业高度繁荣的市井生活为基础。它既是封建礼教日趋势微的反映，也是对英雄史诗、志怪传奇等叙事文学传统艺术反映的结果。因此，即使极度暴露性的伦理小说，如果在某个时期大量涌现，其中必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因此，我们必须加以相应的研究，既不能象道学先生那样，一言性便以为天崩地裂、世界的末日来临，也不必出于简单的逆反心理，以为是人性解放的极致。

作为社会伦理的表现，性道德总是和整个社会的物质、精神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在我们目前这个刚刚经历十几年禁欲主义的禁锢，目前又处于东西方文化八面来风冲击下的开放时代，性道德的千差万别也是非常自然的。不是伦理学家，难以为人们设计一个完美的道德模式。但有一点，我想是较为清楚的。那就是人毕竟不是性的符号，他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同时又在历史文化的制约中，创造着新的历史与文化。因此，在性的问题上也就最多地积淀着文化。也就是说，人无论如何不只是性的符号，而性却最多地体现着不同的文化特征。

以美国六十年代风靡一时、影响波及整个世界的性解放思潮为例，造成这种现实的历史、文化原因很多，但有几点是显著的。两次大战对西方社会心理的震荡，使占统治地位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包括伦理道德观念）迅速崩溃；战后经济的恢复，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造成物质对精神的压抑；战争前后出生的一代人较少传统的羁绊，这些都使人们对物质的反抗、对灵魂的追求、对个体自由的追求，以性解放的形式表现出来。除此之外，还有欧洲文化的久远渊源。而我们这个具有几

千年封建传统的民族，一夫一妻制的婚姻还仅仅是人们不到一个世纪以前的新鲜记忆，男权中心的思想深入民族的心理。如果不正视这些，生硬地套用所谓必然律的逻辑推理，只能得出非常残酷的结论：既然恩格斯曾讲过人类婚姻的两次进步，都是以妇女权力的丧失为前提，而且称赞妇女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伟大的牺牲，那么，伟大的妇女们，为了“历史的进步”，你们再牺牲一次吧！

这样的结论常常掩饰着男权中心的社会极深的偏见。特别是在今天，由于科技与文化水平的发达，弥补了妇女体力的天生弱项，越来越多的妇女已经和男子一样承担着各种工作。它对妇女及整个社会创造活力的发挥不仅是极为有害的，同时，也很滑稽。耳闻某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与会的女代表因为妇女代表数量少而抗议大会组织者性歧视。男代表则愤然回击，口号是不能让那些平庸的女人走进会场。平庸和女人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而且用在这样的场合，就把问题复杂化了。如果是学术问题，当然与性别无关，只应考虑是否平庸的问题，如果是诸如洗澡一类的问题则无所谓平庸或优秀，重要的只是性别，至少在我们这个文化中至今还是非常必要的，这是以极粗暴的方式将两性之间的差异绝对化。尽管西方有女权主义者认为男人和女人是世界上两大对立的阶级，然而有史以来的所有战争却没有一次是在两性之间爆发的。我们在中国当代许多女作家的作品中所感受到的抗争与愤怒，都反映着中国妇女在追求和男子平等的创造权利时，对和谐美好的两性关系的向往，尽管充满了迷惘、迟疑与感伤，这是她们的作品不同于女权主义的重要标志。人既然不是性的符号，那么，女人也就不是女性的符号。

文学毕竟不是伦理学的教科书，更多的时候，文学作品中

的性描写并不是出于对社会伦理规范的探讨，因此，我们也很难以道德的角度去探讨性描写的正意义或负意义。统观中外文学，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是为商业营利的目的，以粗野下流的色情暴露，迎合一些读者的低级趣味，刺激社会视听。这样的东西难以入流，任何严肃真诚的作家都不会以之为上品，我们也就更不必取法乎下。

其二，是在严肃的写实性作品中为了服务于总题旨的需要，作者以理知或揭露的目的，表现一种特定的生存状态，这是无可厚非的。从巴尔扎克、左拉、福楼拜到俄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大师们，都是以这样的态度，在自己的作品中涉及到两性关系，包括一些直接的性行为，而批判的总体倾向则表达了作家们严肃的主体意向。在我国近年比较活跃的作家中，如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等作品，则大多以认知的态度，通过对某些特定性心理的揭示，描述出一种特定的生存状态。而前者的主题意旨带有对这个民族文化生态与心态的忧患，后者则充满温情地表达了理解和怜悯。这样的作品和第一类作品有着审美本质的根本差异。尽管这些作家更多地借鉴了地方民间文化的韵味和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结构技巧，但就其在小说中表现性的目的与节制态度来说，都没有超出写实的需要。而其总体意旨也没有使性心理的揭示限制在一般生理学和心理学常识的范围。

作为写实的需要，重要的不在于是否写了性，而在于写得怎么样，也就是通常人们说的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尽管性是全人类都具有的普遍人性，但由于文化渊源不同，各民族的性意识及由此形成的心态也是不一样的。曹雪芹的《红楼梦》，对大观园中少男少女的情感纠纷用了不少笔墨，其中有许多细

节都涉及到各种性心理，可以在现代心理学中找到科学的依据。但其表现的含蓄与节制，既符合特定环境中性格发展的逻辑，又有老庄一派古典哲学生命意识的文化渊源。它对今人的启迪是，即使言性写性也不一定要那么赤裸裸，认知与情感的协调是审美表现的必要前提。

与此相反的另一例子，是辛格的《卢布林的魔术师》，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叙述了一个完全不信神的犹太魔术师的故事。其中有不少性的描写，但作者的兴趣显然不在于性本身，整部作品的意旨相当严肃。雅克聪明过人，从不去教堂而且敢于亵渎神灵，被教区的善男信女们视为与魔鬼打交道的人。然而，一次偶然的事件，却使他内心深处的宗教意识猛烈地爆发出来，转而成为一个虔诚的苦行者。如果了解一下欧洲中世纪与文学中灵肉二元的传统，就不难理解，作者在这部作品中揭示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真理，而是在以圣经为代表的希伯来文化影响下，犹太民族心态中难以克服的宗教意识。因此，作者的全部性描写，意义都不限于性本身，尽管他在描写过程中充满了审美的激情。近年不少国内作家也都在探索包括性意识在内的民族文化心态，也就是把性意识与性心理作为民族文化心态的一部分来表现，这是一个很好的路子，既可以深化表现人性的深度，又突出了民族的特征，可以避免东施效颦式的性描写时髦。如果能把理知的严肃与故事的生动性，在审美表现中结合起来就更好了。林斤澜的《溪鳗》应该说在这方面成就突出。他以扑朔迷离的风格，掩饰起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真切的恋爱故事，而包括性心理在内的地域和民族文化心态，不着痕迹地溶化在故事中。

第三种情况，在许多作品中性是一个艺术的符号，而它所负载传达出来的意义却带有作者各自不同的意向。这在二十世

纪大量具有象征意味的作品中较为普遍。一个例子是劳伦斯的大量作品（声明一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我没有看过），从国内出版的集子看，他对性的表现并没有多少涉及性行为本身的内容，而是两性之间各种各样微妙的气氛，推而广之为生命自身的魅力。这不仅是他艺术思维的特点，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人性的审美理想，因为他认为只有在两性关系中，人们可以实现社会生活中难以实现的平等理想，因此一切争斗、磨擦、痛苦、欢乐才具有了诗的韵味。性在他的作品中，意味着生命最自然的魅力。阿西亚·马尔克斯在性的表现上要比劳伦斯直率得多。《百年孤独》即使从国内出的删节本看，也充满了大量性行为的描写，带给人的也很少有美感，但这个作者性意识的严肃性却难以置疑。性在这部作品中是个明显的符号，象征乌苏娜家族原始的生命活力。这个家族的每一代成员中，都有一部分人被粗野的原始本能驱使着盲目地生存。相应作为理性的代表，另一部分人则几乎是在禁欲的状态中，一代一代不屈不挠地研读着羊皮书，等到羊皮书所象征的家族命运终于被读懂的时候，这个家族的生命力也已经衰弱不堪，应验了“猪尾巴孩子”的遥远传说。作者从而表达了对拉丁美洲百年历史的孤独感受及未来命运的巨大忧患。正是这样严肃的主题意旨，把大量性行为的表现，限制在象征的意义中。

在我们现当代作品中，也在这方面有一些引人注目之作。从沈从文一系列以湘西社会民俗民风为素材的作品，到贾平凹的《商州初录》、阿城的《遍地风流（一）》、莫言的《枯河》、《大风》、郑万隆的《异乡异闻录·黄烟》、李杭育的《土地与神》等一系列作品，在涉及到两性关系、性行为 and 性心理的时候，也都有着不同程度和意向的象征意味。或寄托着浪漫主义的激情，或表达了自然舒展的人性理想，或者是充满

本能反抗的生命活力，或者是和谐恬淡的生存愿望，很难从性本身的意义上进行道德的理解和评价。

综上所述，文学不可能也不必要讳言性，但在任何层次上也不必把性奉为至尊。初民文化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了，而现代社会的性崇拜狂热又并没有给人们留下什么伟大的作品。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至今没有摆脱贫困的民族，有才华有追求的作家，应该立足本民族生活的土壤，不必为了迎合外国读者或赶浪头，去模仿国外二三流小说中那些恶俗不堪的性描写。这样既会失去本民族的读者，也会糟塌自己的才华。同时，作为文学的小说，也没有必要把作品等同于生理学或心理学病案的琐细罗列，而是应该以审美的理想为中心，通过洞察人类的历史与现状，通过对中外优秀文学传统的扬弃与吸收，更富于创造性地开拓自己的艺术思维，以创造越来越多的好作品，丰富民族乃至世界文学的宝库。

1987.3.8

中国近年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

这显然是一个不大好作的题目。

我面临这样的困难，即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所知甚少。由于语言等多种限制，我只能通过国内的译本（主要是选本）和专家们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成果去了解。所以，很可能是非常皮相的，甚至是歪曲的。其次，对于当代小说阅读覆盖面也很有限，这两点就决定了我只能管中窥豹式地陈说己见。

—

一个时代的文学总是脱离不了这时代的社会生活，脱离不了该时代的学术思潮背景与该民族文化心理的背景，以及基本的历史母题。国情的限制常常决定了一个国度文学的特殊性质。就象西方现代主义的诸多流派中，“后期象征主义由法国遍及欧美，以德国为中心的表现主义，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未来主义，以法国为中心的超现实主义和以英国为中心的意识流文学”

（引自袁可嘉等选编《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序言》）都绝非偶然地以不同的形态，同时分别出现在不同的国度一样，在我国当代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也很难产生严格意义的现代主义作品。

这首先是由于历史文化的明显落差。当西方社会已经开始产业革命的时候，中国尚处于大一统的封建专制集权的统治之下；当西方社会开始意识到后工业社会危机的时候，中国人民仍然在为民族民主革命而流血牺牲。尽管两次大战缩短了东西方社会的距离，但由于二战后全球性冷战的形势与国内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又经历了“史无前例”的一场大浩劫，加上随着“老年马克思”的被发现，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也争论了几十年。于是面对世界历史格局中民族近代以来的历史，我们除了必须承受情感的巨大苦痛之外，也深感到理性的困惑。

这样严峻的历史事实，当我们在民族现代化这一基本的历史母题之下，观照审视我们中国人的生存历史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感叹，百多年来，一场又一场的革命，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使很少有哪一代中国人能免除动乱之苦。即使在今天，禁锢封闭了十几年以后，二十世纪骚动的世界浪潮，随着东西方文化的八面来风，迅猛地冲击着这块国土的时候，东西方文化价值的又一次大撞冲、大交汇，带来了民族心理的又一次大的分裂。无论是西方文化中人文哲学的兴起，还是现实生存的艰难，都迫使人们在过往的历史中寻找激情，加上民族精神自我确立的需要，都使文化寻根成为这个时代学术思想的主潮。

在这样复杂而特殊的民族情绪与文化心理的时代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中国近年小说，很难产生严格意义的现代主义作品。而且就笔者对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近年小说的了解来看，我们没有严格意义的现代主义作品，将来是否能够产生也仍可置疑。就是文革前后出生的一代中国人，虽然较少传统的羁绊，在生活方式与心理结构上更具有全球性的现代特征，也不一定就能够出现严格意义的现代主义作品。如果进一步分析，

原因如下：

1. 物质生活水平的限制

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还在为摆脱贫困而进行着艰苦的奋斗，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为了起码的生活资料几乎要耗尽毕生的精力。这就使绝大多数中国人习惯抹杀自己的感觉，善于隐忍，难以理解认同西方后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对于物的压迫而产生的异化。在中国近年小说中，虽然也有揭示异化的作品，譬如宗璞的《我是谁》，但主要揭示的是由于政治导致的社会动乱，主人公在社会性的政治迫害中，由肉体到精神的全而崩溃，致使产生了强烈的被异化的自我丧失感。韩少功的《蓝盖子》也属于相近意向的作品。这和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所表现的意向，只有感知内容的相近，却属于完全不同的历史母题。且变形夸张的程度也有相当大的距离，中国近年小说中表现自我的丧失，很少夸张到人变成物理性质或生物性质的非人的程度。

2. 缺少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哲学土壤

中国传统的哲学，无论是重视现实伦理实践的儒家，还是宣扬宇宙万物同一的庄禅，强调的都是实践理性的精神，个体的生存意志与整体的生命意识有着从属关系。而近三十年的集体主义教育更强化着这种现实倾向的伦理实践精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被接受传播，在很大意义上，也是以这样的哲学为基础，使之迅速的东方化的。譬如，著名作家王蒙在他文学观念的宣言中，就曾提到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是“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这体现着中国古代原始的大同理想（参见王蒙《漫话小说创作》）。由于缺少西方传统哲学中灵

肉二元的传统，也没有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的哲学基础，更没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西方现代哲学、心理学、美学、语言学的基础，因此很难设想能产生严格意义的现代主义文学。

当然，不可否认，随着开放，西方现代主义的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美学等等，对青年们有极大的影响，但这影响也不同程度地中国化了。

3.文化心理机制的障碍

这样的生存水平，这样的哲学传统与现实土壤，就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机制偏向于和西方人不尽相同的艺术趣味。重视日常伦理的和谐、重视心性的平静，喜欢经验、想象力构成的智慧，偏于现实成功的价值取向，排斥极端的绝望。因此，我们最多只有“活人的颓唐”而少有彻底的颓废，也难以承受尼采式狂躁不安的情绪，就象“伤痕文学”中一定要留一条“光明的尾巴”一样，除了外部的原因之外，主要的根源是文化心理机制在起作用。而且，中国民族民间的文化传统也太丰富太博大，使人们永远可以找到安顿灵魂、逃避现实苦痛与平衡精神心理的避难所。近年来三十五岁左右的作家们寻根的热情，就主要集中在富有宏大的宇宙观的庄禅与富有浪漫主义气息和自由活力的民间文化两个方面。

此外，我们的中国文学自身的传统及读者的欣赏习惯也是一个因素。“重教化”、“文以载道”、“文章合于时而著”这一派文学传统，加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强调文艺的人民性传统，不仅使以反映论为依据，强调文艺现实社会功用的文学观念，在多数作家中占有主导地位，也对读者的接受带有审美心理的定势作用。因此，我们总是发现古老的叙述模式一再被当代作家所重复。（参见黄子平《同是天涯沦

落人——一个叙述模式的抽样分析》)。

凡此种种，都使许多真诚的中国小说家，处于这样的两难之境：一方面知道小说首先必须是艺术，另一方面又难以漠视本民族现阶段的基本矛盾与任务，难以漠视现实民生的疾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近年小说没有影响。

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中国的绝大多数作家对西方现代主义的了解，也同样有赖于国内翻译出版界的工作。这本身就是二度接受，带有间接性质。再一个明显的间接性质，则在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首先影响到一大批西方现代小说家之后，才随着这些作家作品的为中国作家所了解，而进一步影响到他们的创作。而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中国近年小说之间媒介的，主要是拉美作家及英国、苏联与日本的一些作家。譬如：海明威、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乔依斯·卡·欧茨、毛姆、胡安·鲁尔佛、劳伦斯、艾赫马托夫、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等。此外，现代主义的绘画（如梵高、高更、毕加索），现代主义的音乐、现代特征的建筑、电影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中国近年小说的风格变迁。这就使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小说的影响带有多媒介综合性质。

此外，人们还应记得中国现代小说，原有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借鉴拿来的历史。譬如，施蛰存、穆木天这些当时被称为新感觉派的作家。现时被认为是典型的继承传统的作家汪曾祺，四十年代也曾经在艺术手法上借鉴西方意识流文学（参见《汪曾祺小说选集·鸡鸭名家》）。特别应该提到的是鲁迅，他对象征与内心独白等现代小说技巧的纯熟运用可以看作是最早的实践。当然，他更多的是从陀斯妥耶夫斯基等现代主义史

前时期的作家及日本作家等多方面获得启发。（参见孙玉石《野草研究》、刘柏青《鲁迅与日本文学》）。如果说近年有一些中国小说家，有意识地通过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而反叛传统的话，不如说这是向一个更大的“拿来传统”复归。

具体到我要作的这个题目上，由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近年小说影响的多渠道、多媒介性质，就更增加了难度。但总的来说，我认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近年小说的影响，主要是心智的启发、风格的暗示与形式技巧等方面的借鉴。

二

所谓心智的启发，是指现代主义文学及其哲学背景，对中国当代小说家思维惯性的冲击，对中国小说中深层的心智模式的启迪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1. 审美意识的蜕变

在中国当代前二十七年的小说创作论中，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是反映论，即以典型的方式，反映外部社会历史的变迁，进一步的庸俗化，则是作为政策的图解工具，要求作家们急功近利地为政治的中心任务服务。而现代主义的文学则无论其各个流派对文学本体的认识有多少差异，譬如：可以是强调直觉，可以是强调体验，或者是强调理性认知，或者注重发掘前意识、潜意识，但就其创作论的基本特征来说，都是表现为小说的基本功能。当然叙事学走得更远，专门研究小说的独特表现形式及功能。

这种表现说的创作论，近年来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小说家所

接受，并且付诸于艺术实践。但具体到每一个具体的作家，则其接受的心理基础是很不一样的，有的来自现代主义文学及其美学基础的直接启发，有的则只是根据自己对世界人生的感受，不自觉地悟到的。譬如，以表现农民见长的著名小说家高晓声，就其多数作品的写作技巧来说，没有超出写实文学的传统，但基本的内容则在于表现自己对农民当代命运及其社会历史根源与精神心理方面的认识与思考，及至《杭家沟》等作品则几乎只是以农民的生活为载体，表现自己直觉到的，充满了偶然性的世界人生状态。而林斤澜从文革后最初的被称为“怪味小说”的作品开始，到最近的《矮凳桥传奇》，始终坚持着表现自己对时代生活的感知内容，只是前期在手法上也接近西方表现主义，而后后期则以扑朔迷离的风格，带有更多中国叙事文学自来的形式特征。王蒙复出之后，从写《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一类介入现实政治生活的作品，到《夜的眼》开始的一系列被笼而统之地称作意识流的作品，审美意识明显地由“干预生活”向表现自我对外部生活的感受转移。而具体的创作又从表现“故国三千里，风云二十年”的精神体验，到写面对生活转机的浅层次心理感受，以及最近的对混乱世风的荒诞感觉。（王蒙创作的这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有如下代表作品《杂色》、《惶惑》、《冬天的话题》）

对于更为年轻一些的作家来说，表现说适应了他们表达主体浪漫主义情愫的需要。浜田正秀认为表现的艺术，就其本质来说，也是浪漫主义的。（参见浜田正秀《文艺学概论》）中国目前最活跃，处于创作高峰时期的青年作家，譬如：阿城、贾平凹、莫言、张承志、张辛欣、李杭育、郑义、郑万隆、马原、刘索拉、王安忆、残雪、韩少功、张炜、陈村、矫健等等，都多多少少是在浪漫主义的前提之下，表现自己对世界人生的